

中国缘何放弃对日战争索赔



1972年9月2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来访的日本内阁总理田中角荣(中)和外务大臣大平正芳(右)。

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后,清政府以战败国的身份付给战胜国日本2.3亿两白银作为战争赔偿,这相当于当时清朝国库3年的财政收入。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饱受侵略战争蹂躏的中国却没有得到日本应有和及时的战争赔偿。此后,由于时事变换,最终中国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

1945年由中、美、英三国发布的《波茨坦公告》中,第一次明确了日本赔偿的原则,日本可以保留维持其经济运转所必须的工业设备和实物,其余的可以用来赔偿。战后初期,美国对于日本赔偿的态度还相当积极,后来稍有动摇,但还是于1947年4月4日采取单独行动,发动了“先期拆迁”。可是随着美、苏对立日益尖锐,再加上中国人民解放战争顺利进展,美国的外交政策就有了根本性的转变。在远东方面,美国亟盼建立一个反苏反共的基地,而环顾全球,只有在它控制下的日本最符合这个条件。于是扶持日本、抵赖赔偿,就成为美国的基本方针。

本来,按照1946年3月美国政府所制定的“临时赔偿方案”,“先期拆迁”计划将日本工业设备实物的30%作为直接受日本侵略国

家的赔偿物资,其中中国可得15%。但是,随着时局的变化,美国为自己狭隘的战略所考虑,对这个30%的赔偿范围一减再减。最后中国只得到了微不足道的一部分。这期间国民党政府派出的中国首席代表吴半农多次严正交涉。但美国一意孤行,不予理会。中国战时损失,据国民党行政院赔偿委员会的估计,按当时价格计算,不下620亿美元,而中国分得的赔偿物资才约值2250万美元。中国分得的赔偿物资中,最大、最新、最完整、最切合需要的成套设备首推吴港“11-5-5”海军兵工厂的1.5万千瓦发电设备一套;其次是同厂的200吨码头式起重机一具。就在这两套设备拆卸时,美国政府于1949年5月13日向盟总颁发临时指令,取消了“先期拆迁”计划的执行,停止了日本对各盟国的赔偿。至此,战后对日索赔的事宜实际上已被美国腰斩。

1949年下半年,美英协调策划单独对日媾和。此时,中国的局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国民党政权土崩瓦解。12月底,国民党当局全部撤到了台湾。至1950年4月,印度、英国、印尼等国家承认了新中国。

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加紧了单独对日媾和的工作。在抗日战争结束之后,作为当时国民党政府首脑的蒋介石,也曾有过对日索赔的打算。此时,台湾当局为得到美国的支持和帮助,在日本赔偿问题上一改原来的积极立场,转而专看美国的脸色行事——关于赔偿问题,台湾当局表示可酌情核减或全部放弃。国民党对日索赔态度的转变,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还在于蒋介石坚持反共而对日本反共政府采取的所谓宽大、不进行报复的政策,以实现它以中国合法政府的身份参加对日和约的签字。因为日本曾在此前威胁说,要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谈判,签订双边条约。其实,这是外交家出身的日本老官僚吉田茂玩的一个阴谋,目的是迫使台湾当局在谈判中作出让步,放弃战争赔偿,与日本媾和。

1952年2月17日,台湾与日本和约谈判正式开始。谈判几经周折,台湾当局多次妥协让步,综观整个签约过程,台湾当局为求得一个所谓“中国合法政府”代表的形象,步步退让,在战争赔偿等实质问题上彻底放弃。1952年4月27日,台湾当局与日本签订所谓的“日华条约”,双方宣布“结束战争状态”,建立所谓的“外交关系”。而此时,中国大陆与隔海相望的日本的关系还处于冰冻期。日本政府追随美国采取敌视新中国的政策,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设置了不少障碍。随着民间贸易与文化交流的不断发展,恢复中日邦交已为期不远。但恢复邦交,必然要对战后日本赔偿问题作出决定。在这一问题上,我国领导人表示了向前看的姿态。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将蒋介石的代表从联合国的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70年代初,由于国际战略格局发生变化,美国外交政策实施了两项重大转变:一是美国承认中国并对建立外交关系进行谈判;二是征收10%的进口税,主要目的是打击日本,同时停止美元和黄金的兑

换。这两项与日本关系极为密切的政策出台,美国人事先却没有打个招呼,而是以一种突然袭击的方式,狠狠打击了精神上毫无准备的日本。不久,不得人心的佐藤政权垮台,田中角荣出任内阁总理大臣。田中就职后立即宣布把中日邦交正常化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随着邦交正常化时机的成熟,战争赔偿问题又一次摆在中日两国政府的面前。在田中访华之前,他曾表示,如果对方提出赔偿,只要数额适当,他打算赔。

1972年7月以后,中国为实现与日本邦交正常化进行积极的准备,周恩来总理就放弃战争赔偿问题作了下述指示:第一,中日邦交恢复以前,台湾的蒋介石已经先于我们放弃了赔偿要求,共产党的肚量不能比蒋介石还小。第二,日本为了与我国恢复邦交,必须与台湾断交。中央关于日本与台湾的关系,在赔偿问题上采取宽容态度,有利于使日本靠近我们。第三,如果要求日本对华赔偿,其负担最终将落在广大日本人民头上,这样,为了支付对中国的赔偿,他们将长期被迫过着艰难的生活。这不符合中央提出的与日本人民友好下去的愿望。周总理的态度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博大襟怀,也代表了一个泱泱大国的宽容大度和长远眼光。1978年8月12日,北京发表了《日中共同声明》,中日两国签订了《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同年10月23日生效。

二战结束后,苏联从德国获得120亿美元的战争赔偿;犹太人从德国获得600亿美元的赔偿。而中国政府从中日人民世代友好的愿望和长远利益出发,放弃了赔偿要求。必须指出的是,中国政府虽然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即放弃了1200亿美元国家间的赔偿要求,但是,就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罪行的赔偿要求——1800亿美元的国民赔偿要求,中国政府在任何场合都没有宣布予以放弃。这种对受害赔偿要求的保留,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符合国际法的向日本提出受害赔偿的机会。(摘自《文革》)

1896年李鸿章受命与俄国结盟

1896年5月18日,清廷特使李鸿章到达俄罗斯旧都莫斯科。

当然,在红地毯和隆隆响礼炮声中,俄国人所要传达的,是有着现实的利益考量:“借地修路”,借中国之地,修俄国之路,西伯利亚铁路可以从赤塔直线通向海参崴,所“借”之地归俄国所有,并可以派兵驻守。在这个如意算盘之外,一道精美的包装打动了中国人的心:中俄结盟,对抗日本。

甲午战败后,中国太需要朋友了。俄国联合法、德,强压日本归还辽东半岛,这在中国朝野赢得了广泛的尊重和感激,甚至也引发了清廷外交战略的大调整。

俄国开出的价码,仅“借地修路”一项,还是件双赢的好事,当然令清廷喜出望外,愈加感觉俄国够哥们。中俄密约仅经过几次电文往来,就迅速地得到了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的批准。

李鸿章在俄国的长时间逗留,令西方各国嗅到了中俄之间正在发生某种大事。这一时期的西方报纸,都充斥了对中俄密约的猜测,以及两国政府对此的坚决否定。

一个广为流传的疑案是:俄国政府为密约向李鸿章行贿了三百万卢布。这笔对李鸿章的政治品格杀伤力最大的特别经费,虽然名为“李鸿章基金”,但经众多历史学家考证,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是李鸿章收取的贿金。

超规格的接待以及中俄密约的顺利签订,这些都令李鸿章在俄罗斯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但中俄密约墨迹未干,“同志加兄弟”的俄国人突然翻脸,先是和德国一起演出了出双簧:德国借口要为被“暴民”杀害的传教士讨个说法,出兵胶州;俄国以协助中国为名,随后派出军舰占据旅顺大连。

中俄结盟,对俄而言未必是权宜伎俩。英国扶持日本的目的就是遏制俄国,中俄结盟对俄而言是必然的战略选择。但俄国执政者后来的短视,破坏了中俄密约的战略意图。俄国强占旅顺大连的“侵占行动,实为反条约,达到极点”。

俄军的铁蹄令中国人尤其是李鸿章承受了前所未有的被出卖、被愚弄的痛苦和愤怒。经此创痛后,中国的外交再度由“有联有拒”往回收缩,不只是退回到“一体拒外”,而是“一体仇外”,终于爆发了义和团运动。在随后的日俄战争中,尽管之后清政府宣布中立,但无论朝野,都一边倒地站到了日本的一边,不少中国人甚至与日军并肩作战。

(摘自《人民网》)



李鸿章出访欧洲期间

鲁迅和林语堂不欢而散



林语堂

论、出版、集会等自由。林语堂是蔡元培的英文秘书,宋庆龄又是他敬佩之人,他理所当然地担任了宣传主任,是仅次于蔡元培、宋庆龄和杨杏佛的第四号人物;还拿起笔讽刺嘲笑中外法西斯,连希特勒也不例外。鲁迅也是民盟的积极分子,两位战友并肩作战,为人道主义而奔走。

民盟的活动,让南京当局很恼火,想暗地里除之而后快。蔡元培和宋庆龄在国际上有很高的名望,杀掉他们,波动太大,他们选择了向杨杏佛下手。

1933年6月18日,杨杏佛乘车刚驶出中央研究院的大门,就响起几声沉闷的枪声。杨杏佛当场死亡。

惨案一出,世界震惊,所有的舆论都倾向于民盟一边。可政府不管这些,特务机关“蓝衣社”放话出来,说他们有一张五六十人的暗杀名单,民盟主要领导人都榜上有名。

林语堂作为民盟的宣传主任,受到的冲击可想而知。荷枪的便衣每天在林家门口晃来晃去。

一个月后,林语堂写了篇《谈女人》,这当然只是一时气话。他

的闷气憋了几个月,最终还是忍不住,奔泻而出,这就是著名的《论政治病》。

好友的故去让林语堂悲痛欲绝,更让人难过的是,他和鲁迅又产生了误会。6月20日,举行杨杏佛的人殓仪式。林语堂正在被严密监控,出不得门。鲁迅去后没见到语堂,很生气,“这种时候就看出人来了,林语堂就没有去,其实,他去送殓又有什么危险!”

事实上,据《申报》报道,林语堂参加的是7月2日杨杏佛的出殡下葬仪式,也是冒着生命危险去的。那一次,鲁迅没有去。林语堂没有解释,他觉得清者自清,没必要自我辩护。

首先引起轩然大波的便是周作人的五十自寿诗。为了给新创办的《人间世》杂志造声势,林语堂把周作人的自寿诗抄给相熟的文化名流,再索取和诗,同时刊发在《人间世》创刊号上,并配以周作人的巨幅照片。这一番精心渲染,周作人的诗作和《人间世》果然轰动一时,满城传诵。

左联早就看不惯林语堂提倡幽默的那一套,而自寿诗事件又确实有使文艺界庸俗化之嫌,一些血气方刚的革命小将带头造反,指着林

语堂的鼻子骂了一通。鲁迅也骂林语堂的幽默文学是“麻醉文学”。先前,《论语》的幽默杂文得罪了不少右派作家,右翼分子也一哄而上,恶语相向。

其间,又发生了几件小事。在一次饭桌上,几个广东作家兀自讲粤语,说得兴致盎然,其他人听不懂。林语堂故意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表示是鸡同鸭讲,逗趣一番。不料鲁迅厉声道:“你是什么东西!难道想用英语来压中国的同胞吗?”林语堂哑口无言。

后来鲁迅曾写信劝告林语堂不要搞这些小品了,多翻译点英文名著才是正途。林语堂回信,“等老了再说。”时过一年多,鲁迅给老友曹聚仁写信,提到了这件事:“这时我才悟到我的意见,在语堂看来是暮气。”林语堂听说后,无奈地解释道:“我的翻译工作要在老年才做。因为我中年时有意思把中文作品译成英文……现在我说四十译中文,五十译英史,这是我工作时间的安排,哪有什么嘲笑意思呢?”一次又一次的误会,最终,鲁迅不再把林语堂当朋友了。

两年之后,林语堂远赴美国,终此一生,两人再没有相见。

(摘自《人民网》)